

TAOXINGZHI YUYAN SIXIANG YU YUYAN SHIJIAN YANJIU

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研究

● 顾问 王国聘 许承明
● 主编 郭 骏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研究

郭 骏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研究 / 郭骏主编.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672 - 1550 - 4

I. ①陶… II. ①郭… III. ①陶行知(1891 ~ 1946)
— 语言学—文集 IV. ①H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598 号

书 名: 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研究

主 编: 郭 骏
顾 问: 王国聘 许承明
责任编辑: 李 兵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20 千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550-4

定 价: 40.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序 言

PREFACE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典范和旗帜,是晓庄人心中高耸的丰碑与永远的骄傲!

陶行知先生在开创与发展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进程中,在培养乡村教师、探索中国现代化教育之路,形成晓庄育人文化的过程中,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付诸实践,为我们晓庄,更为中国的现代化教育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教育遗产。这份厚重的遗产,既是晓庄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永恒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重要的理论支柱与实践样本。陶行知先生的大爱教育思想告诉我们,“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要培养有爱心、热爱中华民族、服务中华民族的人才;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晓庄精神”,就是抬头乐干的乐观向上精神、百折不回的顽强奋斗精神、志同道合的团结合作精神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陶行知先生所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告诉我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一既具有国际视野又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至今在中国教育实践中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极高的现实价值。

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和理论是我们晓庄发展的坚强基石。学习陶行知,研究陶行知,是我们每一位晓庄人应尽的职责;传承陶行知思想,弘扬陶行知理论,光大陶行知精神,是我们每一位晓庄人不懈的追求。

为推进我校陶行知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为多视角研究老校长的思想和理论,文学院郭骏教授带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团队,打破了仅从教育学的视角来开展研究之局限,立足语言学研究视角,从语言规划、语言教学和语言运用三方面着力探讨陶行知的语言规划思想、语言教学理论与语言实践经验,形成了“陶行知语言规划观研究”、“陶行知语言教育观研究”与“陶行知语言实践

观研究”三大研究板块。自 2009 年着手开展研究以来,各位研究者按照整体研究框架,分工合作,分步推进,历时七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境内外的学术刊物、专业书籍中发表或出版专业论文 20 篇,现由学校资助汇集出版。

该文集是我校陶行知思想和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学校构建与弘扬陶行知文化的一项标志性成果。同时也为我校的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培育点——“陶行知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建设,提供了较为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其建设与发展。这是中国“陶研界”第一本有关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的研究论集,属开创性研究,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好的社会效益。该文集的出版为全国陶行知研究提供了参考,也为我校在全国陶行知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and 名望的提升起到了助推作用。

我相信,《陶行知语言思想与语言实践研究》的出版一定能促进和推动我校陶行知研究走向深入。同时,我也衷心地希望,我校的专家学者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能积极组建研究团队,对陶行知思想理论开展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出具有前瞻性、时代性与标志性的重量级研究成果,真正承担起晓庄作为陶行知研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王国聘

2015 年 10 月 5 日



目录

CONTENTS

陶行知语言规划观研究

陶行知有关“大众语”与“新文字”的论述	郭 骏(3)
陶行知语言规划观及其历史意义	郭 骏(13)
陶行知的语言文字思想及其实践	刘晓梅(25)
试论陶行知的拉丁化新文字观	刘 倩(31)
陶行知语言文字观述评	苗 昱(38)
陶行知大众语文观试析	徐 扬(47)

陶行知语言教育观研究

论陶行知平民教育教材的识字教学理论	王 茜(59)
陶行知平民教育教材编写思想对汉语国际教育的启示	王 茜(64)
陶行知平民教育教材中的国民精神	王 茜(71)
修辞认知视角下的陶行知教育思想和语言实践研究	王 茜(77)
陶行知语文教育思想阐释	贡如云(84)
“活的教育”思想与汉语国际教学	印 平(89)
《平民千字课》的现实意义——对编写对外汉语初级教材的几点启示	武文翔(99)

陶行知语言实践观研究

陶行知语言风格论析	钟玖英(109)
陶行知的语用策略	钟玖英(117)
陶行知演讲语言艺术初探	钟玖英(127)
陶行知演讲语言艺术探析	李志兵(133)
陶行知诗歌价值论析	钟玖英(143)
陶行知的诗歌理论和诗歌语言实践	冯 军(155)
陶行知书信的语言风格	刘晓梅(163)

附录：陶行知有关语言文字的论述

(169)

文言白话又一战	(169)
大众语文运动之路	(170)
怎样写大众文	(172)
再谈怎样写大众文	(173)
白话文与大众文	(175)
新文字创造之商榷	(176)
大众的文字	(178)
谈文字符号	(180)
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答复黎锦熙先生	(181)
中国新文字	(183)
《平民千字课》编辑大意	(186)
四个先生	(188)

后记

(190)

陶行知语言规划观研究



陶行知有关“大众语”与“新文字”的论述

郭 骏

引 言

依据现有的研究资料,我们发现,陶行知(1891—1946)作为教育家,教育界的研究者们忽视其尚有大量关于语言文字的论述,而语言学界的研究者们又未能关注到陶行知曾积极参与语文运动并对语言文字留有大量的论述。如专门研究拉丁化新文字、具有详尽的历史资料、由亲历者倪海曙编著的《拉丁化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在收有470篇的“篇名索引”(1987:421-435)中没有收录一篇陶行知的文章。专门研究中国现代的文体改革、语言规范、文字改革等语言计划事项的史论性著作《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高天如,1993),其中三章专门研究“大众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汉字简化工作”,没有介绍陶行知的任何一篇文章,书后“综合索引”(237-259)中也没有收录陶行知一篇文章。这就给陶行知研究留下了真空地带,留下了研究的空白,这就有待于我们去研究陶行知有关语言文字的论述^①,去填补其空白。诚然,就陶行知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文章而言,其数量占他全部论述的比例不是很大^②,但也是陶行知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研究内容。对其语言思想开展系统研究,既是对陶行知本人理论思想研究的一种丰富,同时也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文运动研究的一种丰富。

现依据《陶行知全集》第1版(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和第2版(四川出版

① 通过期刊网查询,论及陶行知语言思想的文章目前仅见一篇,即刘晓梅发表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的《陶行知的语言文字思想及其实践》。

② 据《陶行知全集》第1、2版“凡例”,全集共收有“文章、诗歌、教材、书信、演讲、小说、谈话、章程、提案、文电、广告、备忘录等2530篇”。据笔者阅读统计,专论“大众语”和“新文字”文章14篇,兼论或论及文章约26篇,共计40篇,约占全部篇数的1.58%。

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所收有的文献,结合大众语运动和新文字运动的历史背景、开展过程、陶行知的参与情况等相关文献资料,就陶行知关于“大众语”与“新文字”的论述分“陶行知有关大众语的论述”、“陶行知有关新文字的论述”两部分做具体分析。

陶行知有关“大众语”的论述

大众语运动是指“1934年在上海掀起的一个要求白话文写得更加接近大众口语的书面语文改革运动”(戚雨村等,1993:16),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起因有三:一是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文学语言需要更加接近大众;二是白话文出现了半文半白和欧化两种明显的偏向;三是白话文的不良偏向给复兴文言的人以可趁之机(于根元,1996:53-55)。

汪懋祖1934年5月和6月在《时代公论》上连续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两篇文章,提倡“尊孔读经”,主张“文言复兴”。随即许梦因在《中央日报》和《时代公论》上分别发表文章支持汪懋祖,又一次挑起了文言与白话的争论。吴研因先后发表《辟小学参用文言与初中必读孟子及指斥语体文诸说》、《读汪文〈中小学文言运动〉后的声明》率先反驳。《申报》副刊《自由谈》于1934年6月18日、19日相继发表了陈子展和陈望道的文章,正式提出“大众语”口号。自此,上海及全国各地许多报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汉语书面语的论争。

陶行知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并就大众语的标准、白话文与大众文的关系、如何写大众文等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对大众语与大众文问题的思考。具体论述如下。

一、对“文言复兴”言论的批驳

陶行知主张,“一切公立学校,都应该教白话文,不应该教文言文;凡合乎现在社会需要的文言文,都应该翻成白话文”(1版3卷,165),并从普及教育和新人才观两个角度论述了学校教育采用白话文的重要性。

1. 普及教育的角度

普及教育是中国的几大问题之一,而要普及教育就必须普及大众教育和儿童教育;而在普及教育中“一千万有资格做小先生的中小学生”,“必须学白话文,因为白话文容易学,容易教”。而如果改用文言文,则“小先生失了效用,中



国教育再等一百年也不得普及”，所以要普及教育，中小学就必须反对文言文（1版3卷，165）。

2. 新人才观的角度

过去是“根据一种似是而非的人才教育论，以为士大夫便是人才，能读古书便是人才”，“殊不知人才的新解释，是抱有学术为大众除痛苦谋幸福的人”，而这种人才“所说的话”应该是“大众能懂的话”；这种人才“所写之文”应该是“大众能懂之文”（1版3卷，165）。

因此，鉴于“大众的要求，儿童的要求，新人才的要求”，陶行知提出不仅不能让“文言文复辟”，还要“逼着白话文进展”（1版3卷，166）。

二、对“大众语”建设的论述

1. “大众语”的界定

“大众语”该如何界定？在大众语争论中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胡愈之从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大众语’应该解释作‘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大众语文’和五四时代所谓‘白话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话文’不一定代表大众意识的。而大众语文却决不容许没落的社会意识，混进了城门。”^①对此陶行知就“大众语”与大众文的结合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同时指出了大众语文运动发展之路。

对于“大众语”的定义，陶行知提出，还需在胡愈之的界定中加上“前进”使之具体化，即“大众语”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话语”，那么“大众文”自然就是“代表大众前进意识的文字”。陶行知同时主张“大众语与大众文必须合一”，大众语文要适合“大众的程度、需要和意识”。“大众语文”可定义为“大众高兴说，高兴听，高兴写，高兴看的语言文字”，“这高兴的境界便是艺术的境界”。陶行知用自己教农人读电影说明书之例，深刻说明那种半文半白和欧化偏向的白话文之弊端：“写起来，大众看不懂，读起来，大众听不懂”，其根本原因在于“白话文不与大众语文合一”（1版3卷，167-168）。

2. 大众语的基准

陶行知指出，“大众语必以一种活语言为基础”，这种“中国四分之三的国人能懂的活的语言，便是滤过的北平话”。因为北平话既有“成为大众语之主要成

^① 胡愈之：《关于大众语文》，原载《大众语文论战》，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版；转引高天如，1993年版，第132-133页。

分之资格”，又“最好听”。陶行知主张将经“过滤”过的北平话作为大众语的基础。同时也主张吸收“各地土语”，“甚至于外国话”，不必仅仅依据“抽象的主观的标准”，而是让大众自己去选择，让大众去“过滤”，保留适合大众口味的成分，淘汰不适合大众口味的成分，这才能体现大众语的要求（1版3卷，170）。

3. 大众语的特征

陶行知在《白话文与大众文》一文中初步提出了“大众语”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具有的特征。首先区分了“大众”与“小众”，然后从“大众”与“小众”语言各自所具备的特征出发来简要说明“大众语”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应该具有的特征。

在语言上，“小众”与“大众”所采用的词汇是不同的，小众说“结婚”，大众说“做亲”；小众说“恋爱”，大众说“轧姘头”（1版3卷，702）。一个文雅，一个通俗；一个用的是书面语，一个用的是口语。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能说“这种分别是毫无问题”。这反映出陶行知的主张，即大众语应该是大众的口头语言，包括方言土语。与陈望道的“大众语应该就是平常的普通的语言”，没有必要“严格拒绝土话方言”^①之说相同。

在文字上，大众语采用拉丁化新文字。因为“汉字难写难认”，已成为“普及大众教育最大的障碍物”。因此，“要想建设大众文，必须采取那容易认、容易写、容易学的拼音新文字”。依靠拼音新文字，“大众自己就可以根据大众语和前进大众意识来创造大众高兴看，大众高兴读，大众高兴听的大众文”（1版3卷，702）。

4. 大众语运动之路

要做到大众语与大众文的合一，大众语运动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知识分子参加大众生活，在大众语演进的基础上努力写作语文合一的大众文”；二是“将生活符号普及于大众，使大众自己创造出语文合一的大众文”。而“知识分子要想写大众文必须先学大众语，他必须拜大众做老师”，“钻进大众的生活里，与大众共生活共甘苦”，“然后他写大众便是写自己，写自己便是写大众”。如果不这样，即不拜“大众做老师”，不在大众队伍里“做一个小兵”，“绝写不出好的大众文”（1版3卷，168-169）。

由于在“大众语”问题的争论中，也涉及“拉丁化新文字”问题，因此，陶行

^① 陈望道：《大众语论》，原载《文学》1934年8月1日第3卷第2期；现见《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224页。

知也论及了汉字、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拼成的大众文等问题(1版3卷,169-170)。

三、对“大众文”写作的论述

1. 白话文的毛病

白话文是“小众”用的而不是“大众”用的,其毛病在于:“白话文,教人聋;读起来,听不懂”。因为“它写的不是大众的事”,所以听不懂;“它写的语句不合大众说话的口气”,所以听不懂。又因为听不懂,所以就看不懂。甚至不但大众听不懂,连“小众”也听不懂。(1版3卷,386)

2. 大众文的写作要求

陶行知在分析白话文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大众文”应该“按照大众说话的口气”,写“大众需要知道的事”。怎样才能做到?“请我们的耳朵来指导”,“凡是耳朵听得懂,高兴听的才把它写下来”。并以顺口溜做形象地归纳,“根据大众语,来写大众文。文章和说话,不能随便分。一面动笔写,一面用嘴哼。好听不好听,耳朵做先生”(1版3卷,386)。

如果是“小众”听得懂而“大众”听不懂的文章“决不能冒充大众文”,因为好的大众文还要“大众”高兴听,如果“小众”高兴听而“大众”不高兴听,“也决不能算为好的大众文”。因此,还不能仅靠我们自己的耳朵,更主要的靠“工人、农民、车夫、老妈子、小孩子的耳朵”。我们每做好一篇文章,读给他们听听,听不懂,就要努力去改,“改到他们听懂了,才算写成大众文”。并列举了他自己写作大众文的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白话诗《老妈子先生》:“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听,可以卖稿子,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最后两句原来写的是“废纸有谁要,只有书呆子”,是在工人学生张妹的帮助下修改而成的(1版3卷,386-387)。

陶行知有关新文字的论述

“拉丁化新文字”,简称“新文字”,于1931年正式产生的由集体制定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研制者“以其所研制的拼音字作为汉语的一种文字符号推向社会”,“希冀最终能替代表意汉字的现实地位,试行文字体制的根本改革”(高天如,1993:169)。这是一次关于试行拼音制文字的群众性实验,“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冯志伟,2004:30)。

陶行知对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仅是非常热心地支持,而且还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并成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这对国统区的新文字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对陕甘宁边区的新文字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35年12月发起成立全国性的新文字团体“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主持起草《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并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共有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688名文化界人士签名(倪海曙,1987:103),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召开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陶行知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倪海曙,1987:184)。

陶行知还著专文介绍、宣传、研究新文字并在各类教育教学研究文章或著作中宣传新文字。在英文刊物《中国呼声》发表 China's New Language 一文,介绍拉丁化新文字。在1935—1936年间发表了《谈文字符号》、《新文字创造之商榷》、《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答复黎锦熙先生》等文章。在《关于现代教育上的几个实际问题》的演讲中论述文字符号的重要性,在《四个先生》一文中将“新文字”作为写大众文的四位免费先生之一加以介绍,在《大众教育与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将“拼音新文字”作为大众教育的新工具列出并与“社会即教育”、“即知即传”两条原则并列,在《文化解放》一文中将大众文字的解放视作“大众文化解放的钥匙”。陶行知关于新文字的论述如下。

一、文字符号的重要性及其在普及教育中的地位

陶行知指出文字符号是非常重要的。其一,人与禽兽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有语言文字,禽兽没有语言文字:“人是会说话的,并且会写字……可是禽兽则不然,禽兽是不会说话的,即如狮子、老虎能说不清楚的话,但是有没有文字符号呢?没有。因为没有,所以禽兽始终是赶不上人的。”其二,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区别在于野蛮人只有语言,而文明人是“语言文字都能灵便的运用”:“文明人的文字是正确的、清楚的,文法简单,运用便利,且文字公开……可是野蛮人的文字是不正确的、含混的,差不多与文明人的文字完全相反的。”(1版3卷,655;2版11卷,497)

关于文字在普及教育上的地位问题,陶行知指出,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而又都是错误的思想倾向:一种是看重文字教育,将其视作教育的“全体”;一种是藐视文字教育,因为大众所需要的“只是生计之改良”。文字虽然重要,但不是教育的全部,要结合大众生活去教文字,“否则便是书呆子的教育”,这就是文字

在普及教育中的地位(1版3卷,655-656)。

二、汉字在普及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端

陶行知指出,干教育普及的人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汉字难认、难记、难写”。而中国要解决国难就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而这教育大众之事,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绝大的难关,那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每一个人必须花费几年功夫几十几百块钱才学得一点皮毛”,而大众既没有这么多时间,也花不起这许多钱(1版4卷,675)。

三、新文字普及之必要

手头字、简字是方块汉字的化身,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注音字母是方块汉字注音的工具,不过是方块汉字的附属品。”国语罗马字又过于复杂,“把初学的人弄得头昏脑黑”。中国大众需要的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拼音新文字。根据上海新文字方案试验,“平常人每天费一小时,只需半月工夫,即可写新文字的信,看新文字的报,读新文字的书”。民众教育培养一个成人,只要花一块八毛钱。所以“新文字是普及大众教育的最经济的文字工具”。如果把文字比作“交通媒介”的话,那么汉字属于“交通媒介”中的“独轮车”,而新文字则是“飞机”(1版4卷,676-678)。

四、新文字运动的特点

陶行知通过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与注音字母及国语罗马字母运动的比较,简要分析出新文字运动的四个主要特点:一是造出来的新文字不是来为汉字注音,而是给那些没有时间学汉字的人去读;二是运用“连词”避开四声符号;三是依据中国各地的发音来规定各地的标准音;四是用新文字写出大众语来代替文言和半文言的白话(1版3卷,354)。

五、新文字的特点

陶行知指出,拉丁化新文字“代表着一个伟大的进步,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伟大进步,而且不久将改造中国人民的全部生活”。新文字与汉字、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相比具有三个特点:(1)与方块汉字相比,它是“表音”的,不是“表意”的;(2)与注音字母相比,它是“独立的语言”,而不是“汉字的附属物”;(3)与国语罗马字相比,它可以“适应各地方言”,可以产生“适合各自方言的新文字变

体”(1版6卷,369-371)。

六、关于方言新文字对国家统一的影响问题

陶行知在主持起草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一文中从四个方面专门探讨了方言新文字对国家统一的影响问题:(1)中国各方言之间的差别并不大,而且是有规律的;(2)汉字能认得的人很少,如果各区的方言新文字教会各区的大众,这样,“不但不至于阻碍中国的统一而且有力量促进文化的沟通,帮助中国的统一”; (3)我们所需要的是各区大众之间生活上的血脉流通,而不是勉强各区过“同一的生活,说同一的话语,写同一的文字”; (4)第四,在空前的国难时刻,当运用新文字传布民族自救的教育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新文字是不但不阻碍中国统一而且确有力量帮助唤起大众挽救我们的垂危的祖国”(1版4卷,677-678)。

七、关于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的辩论

陶行知在读了黎锦熙的《复济南青年文化社书》后,发表《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答复黎锦熙先生》一文,针对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及其相关问题,就六个方面的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1)国货与洋货:北方话拉丁化方案是在苏联海参崴产生的,但制定者是华侨,而且又已经由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改为北方话新文字方案,不能“因为北方话新文字一个方案的出生地关系,就把全国的新文字运动划归苏俄所有”。(2)废止汉字与打倒汉字:新文字运动应该拿易写、易认的新文字而不能拿难写、难认的汉字去教大众,“从速废止汉字”是仅就大众教育层面而言的;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要提出“打倒汉字独裁”的口号,要学习新文字,为大众服务,把新文字教给大众。(3)北方话与国语:北方话新文字方案虽然以北方普通话为根据,但决不希望把北方话当作国语。新文字运动反对北平话独裁,即反对国语独裁。(4)标调与不标调:应持黎锦熙各有利弊、有待试验的看法,即“不标声,拼法简单,词儿不长,较易拼写;标声,面孔明白,词儿不混,易于认读”,这才是科学的态度。(5)有技术与无技术:拉丁化新文字与国语罗马字一样都注重技术问题,但由于目标不同,各自关注点也不同。(6)政治大力量与民族大力量: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华民族大众争取解放之重要工具”,应由整个民族大力量来推动,自己作为“国民一分子”,就得尽“一分子的力量”,就“管得着”(1版3卷,726-728)。